

宁夏文史资料

第十一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宁夏文史资料

第十一期

(内部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2年10月

31482

目 录

崔景岳同志在狱中	马云泽（1）
红军解放盐池城	盐池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9）
隆德县地下党的回忆	陈添祥口述（13）
回忆孙寿名同志	韩溥（26）
马福祥年普概略	和龚（32）
回忆我在宁夏的经历片断	魏绍武（55）
回忆宁夏妇女运动委员会	梁碧梧（62）
“庚子”前后的端王载漪	罗墨林（69）
解放前宁夏教育述略	李雨村（75）

- 宁夏出版报纸史话 董万鹏 (83)
- 宁夏贺兰石及其雕刻艺术 阎子江 (86)
- 贺兰吟 崔俊连 (89)

崔景岳同志在狱中

马云泽

前中共宁夏工委（地下省委）书记崔景岳（廷儒）同志壮烈牺牲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他在敌人法庭上和监狱中英勇斗争的事迹，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工委机关的破坏和景岳同志的被捕

一九三九年底，崔景岳同志由陕西调到宁夏任工委书记，白玉光、王博同志和我当时也是工委负责人。工委机关设在宁朔的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崔景岳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宋澄堡小学教员，我是该校校长，白玉光和王博同志在小坝小学工作。那时候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在宁夏逐渐形成高潮，我们地下党的基层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工委工作环境日趋恶化。

一九四〇年四月上旬的一天，我收到银川西门小学教员杜林写来一封短信。信中说，让工委书记到银川市去商谈要事。我当时想，春节过后不久景岳曾去过银川，三月初我也刚由银川回来，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为什么现在又叫去呢？于是我和景岳同志一起对此信进行了分析。景岳同志考虑到斗争错综复杂，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因此决定亲自去一趟摸一摸。他在安排好工委的工作之后，便带上学校采购东西的证明动身了。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景岳同志到了银川市和平里二十七号杜林家中，正吃晚饭时，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人。杜林介

绍说：这是在西门小学的同事，姓林。又对林说，崔是他的朋友。双方寒暄了几句，林就走了。不久，宪兵就来把崔、杜二人都逮捕了。（以后查明这个姓林的，本名李郁华，国民党特务）第二天我到县政府领教育经费返回时，中途在唐铎堡被捕，被带上脚镣，连夜送到银川马鸿逵的军法处，关押在军法处后院的禁闭室。这个禁闭室是一进两开的房子，崔景岳同志被押在西房，我在东房。虽近在咫尺，但却不准说话。因此，只能互相看着，无法知道情况。恰好，同房还押着马鸿逵部骑兵连的一个班长（山东人），此人同情革命，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收到景岳同志送来的纸条，上边写着：“同乡、同学的关系”。这是他给我对付敌人的指示。因此，在三天两头的过堂审问中，我每次不是被抽皮鞭，就是压杠子，特别是双手反背吊在房梁上轮流捕打。在敌人的严刑拷问下，我始终只说是同乡、同学关系。三天之后，敌人对我们的监视不严了，可以交谈了。他告诉我，由于杜林的出卖，他已经承认是共产党员了。

当时被捕的还有几个抗大学生和中学学生，他们还没有经过怎样审问，就向敌人表示自首，因此敌人把他们押在前院的优待室。不几天，捕们就正式办了自首手续。只有我和景岳同志在后院的禁闭室押着。大约十多天以后，又逮捕了孟长有，他虽承认了自己是抗大学生、共产党员，但却坚决不去自首。因此和我们押在一起。

“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

在禁闭室关押的这些“要犯”中，崔景岳同志又是敌人“审讯”的重点。敌人对崔景岳同志用尽了打皮鞭、压杠子等酷刑，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身体折磨得近乎半身不

遂。可是，有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却没有从他嘴里掏出半个字来。有一天，敌科长张锐一在院子和崔景岳同志面对面地“谈”了三四个小时，软硬兼施，妄图诱劝崔景岳同志自首，景岳同志却理直气壮地宣传了我党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无情地驳斥了敌人。

一次，敌人玩弄了一个新花招，要崔景岳同志对几个叛徒讲话，企图在精神上战胜他。当景岳同志被带进一间不太大的房间时，屋子里已经坐了几个人。敌稽查科长边介绍边说：“你看，他们都自愿放弃了共产主义，回到三民主义上来了。崔景岳，还是你失败了吧？”景岳同志立刻明白了敌人的意图，锐利的目光迅速地打了一圈，便冷笑道：“我很清楚你们的胜利！”敌人听到“胜利”二字，以为他认输了。“那就请你给大家讲讲吧！”敌科长摇头晃脑地说。景岳点点头接着说：“我和在座的各位，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我们今天总算是‘济济一堂’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们原来都是共产党员，不管过去的情况如何，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今后是各走各的路，你们不愿做共产党员也可以，因为一个人的信仰不能勉强。但既然参加革命，却又自首变节，这毕竟是一个可耻的行为。对此，我又感到遗憾。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再不能做那些危害民众利益、民族利益的坏事情……。”敌科长一听，气得直跺脚，指着景岳同志骂道：“好啊，崔景岳，你这个共产党！到现在还宣传共产主义！把他拉出去！”面对敌人的丑态，景岳同志不禁仰面大笑。

还有一次，国民党中央派驻宁夏的一个特务，给崔景岳同志送来五块钱。景岳同志当即回敬说：“这是你们榨取来的人民血汗，只有吸血鬼才能挥霍它，我不能花！”

当敌人劝他把爱人接来给安排工作时，他回答说：“我没有

权利让人家来。”敌人看到无孔可入，便将话题扯到信仰上来：“崔先生，你们用什么办法竟把那些纯洁的青年都拉到共产党里呢？”对此，景岳同志付之轻蔑的一笑，他说：“这是因为共产党人都是纯洁的。象你这样的人，你也不会来，我们也不要。”敌科长起先以为这是“政治课”，过了一会才领略到其中的讽刺意味，不禁满脸涨红，暴躁地挥了挥手，起身离去。“谈话”失败了。

马鸿逵的一个处长曾向马汇报说：“宁夏共产党就这么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些人要释放，有些人要押一些时期，读读三民主义，然后遣送出境。”就在这时，江生玉（抗大学生）向特务汇报，说崔是宁夏省工委书记，崔叫他给延安送的秘密信，他没有送去，在他家房上的椽缝里放着；同时还说小坝学校有两个人，其中白玉光是共产党员等等。敌人拿到密信后，知道了我党在宁夏南北有十二个工作据点以及两个人的名字。于是就追问景岳同志：十二个据点在哪里，那两个人是谁？景岳同志断然回答：“这是我们党的工作，不能告诉你们。”由于叛徒的出卖，白玉光、王博也相继被捕，随之而来的就是疯狂的大搜捕，仅中、小学就逮捕了三、四十名教职员和进步学生。面对这一系列突然事件的发生，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对付敌人的措施。

在法庭上，江生玉指出崔景岳是宁夏工委书记，又指出白玉光是共产党员。敌人拼命地拷打景岳同志，而他始终只说一句话：“你们把我枪毙了！”敌人恶狠狠地说：“哼！枪毙？便宜你了！……”敌人用各种刑罚整整拷打了一个下午。天快黑时，四名宪兵把崔景岳抬了回来。他静静地躺在麦草铺上，遍体伤痕，血迹斑斑。我用双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不要难过，”他的语气低沉、有力，嘴唇微微有

些颤抖。“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最后他又对我说：“看来我要牺牲。你因为没有承认什么，又没有人证物证，估计最后敌人可能放你出去。你出去后，要争取把工委破坏的原因搞清楚，并尽量争取早日恢复工委工作。”

“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这是何等崇高的革命品质！四十多年来，景岳同志的这句话时常萦绕在我的耳边，激励着我前进。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工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之所以免遭敌人的惨害，能够活到今天，与景岳同志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分不开的。

敌人在审讯中采用种种圈套，企图从景岳同志口中套出口供来，景岳同志随机应变对付敌人。在一次审讯中，敌人问他：“在我们党政军机关里谁是共产党员？”他立即诙谐地说：“那就请拿一份名册来，我给你们圈！”弄得敌人哭笑不得。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军法处的审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崔景岳的身体被折磨坏了，可是他的精神始终压倒敌人，使敌人感到害怕，甚至胆怯到谁也不敢提审他的地步！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二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和我们这些被称为“嫌疑犯”的人一起转送到监狱。

漫长的狱中生活开始了。

建立狱中党支部

我们所在的监狱，中央有一座八角形的碉楼，楼上日夜都有哨兵看守。院子的西北角是一座单独的女监，东、西、南是三排牢房。崔景岳、我们工委的另外三名负责人以及孟长有同志，共五人关在南边的一间牢房。牢房里长年不见太阳，既狭小又阴暗、潮湿，充满了霉味；空气只能从牢门上一个碗口大

的小洞进来；至于水，那是根本没有的。敌人给我们每天吃两顿带着霉味的黄米粥，每顿只给一小碗；早晚放两次风，每次仅仅几分钟。此外，每人脚上还要戴一副十六斤重的大铁镣。环境的恶劣，再加上饥饿的折磨，没多久，三名同志身染重病了。

要不要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崔景岳同志思索着，他比我们想的更多，更远。

一天，他让大家凑在一起，讲出了自己的主意：“在反共高潮中，敌人有可能把我们杀害；但我想他们不会把大家都杀完。总的来说，坐监狱将是长期的。目前，短时期的法庭斗争我们已经挺过去了。但是，长时间的监狱生活却有可能把我们的锐气磨掉。”他用严肃的眼光看了看大家，继续说：“我认为，监狱是阶级斗争最鲜明的地方。为了更好地进行斗争，有必要建立狱中党支部。”大家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不仅一致赞同，而且提了许多建议。经过认真讨论，第一届狱中党支部成立了。景岳同志指着我对大家说：“让老马负责。”从此，在景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有了一个坚强的堡垒，开始了新的斗争。

景岳同志要求大家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来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经常给我们讲述毛主席到延安后领导军民，加强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和抗日前线军民斗争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在陕西、甘肃等地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以此来鼓励我们的斗志。他还会讲许多历史故事和其他故事，使人听来津津有味，忘却了身在监狱的痛苦。他请孟长有同志给大家教唱革命歌曲，用歌声向黑暗挑战。他还动员我们自制象棋、跳棋，开展狱中的文娱生活。他告诫大家要注意锻炼身体，多找一些编织等零碎活干干，让手脚灵活起来。他想方设法地做看守的工作，使我

们经常能得到外界的重要情况，不至于完全与世隔绝；同时，在生活方面，他设法托人卖掉了自己的一辆自行车，给大家调剂伙食。

崔景岳对同志满腔热忱，对敌人却毫不留情。在一段时间里，监狱有一个管我们的刘科长，经常寻衅辱骂我们。景岳同志几次都想狠狠地回击他。一天，这个家伙又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并叫着崔景岳的名字说：“你们八路军不抗日，光在后方捣乱，反对国军！”景岳同志立即顶他说：“这个话只有汉奸才能说出口！”这个家伙一听，瞪了瞪眼睛没词儿了。以后，他再也没敢来骂我们。

一九四一年四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狱卒送来了五个烧饼，这是对我们为他帮忙与公文的一点谢意。大家每人一个，一边吃，一边说笑。有的同志提议说：“谁也不准吃得快，要一起吃完。”有的说：“对，少吃才能多香呢！”看到同志们吃的那股香劲，景岳同志高兴地说：“等将来出狱，我给大家炸鱼吃！”我一听便接着说：“到那时候，我给大家包饺子，皮子擀的薄薄的，饺子包的小小的，保你‘一口香’！”“看来，我们出去后能凑合着开个馆子呢！”景岳同志的这个玩笑，开的大家哄堂大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和他最后的一次聚餐！

皖南事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马鸿逵也加紧了反共的步伐。他们要向被长期关押和摧残折磨的共产党人开刀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晚上十点多钟，崔景岳与孟长有同志被敌军法处提走了……。景岳同志临刑前，把身上的一件旧棉袍脱下来，让狱卒转交给同志们抵御风寒。他留给我们的，是同志般的温暖；而我们失去的，却是一位最亲密的战友！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做的完全对”

事后，我们才确切知道，当天夜晚银川全城戒严，敌人在自新门外布置了刑场。当崔景岳和孟长有二同志被带到一个新挖的大土坑边上时，一队荷枪实弹的宪兵围了上来。敌军法处头子问道：“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同志大义凛然，镇定自若，缓缓地说：“我本来没有什么话要说，既然你问，我就说上两句：“人活千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已经感到无尚的光荣，我相信，我做得完全对。作为共产党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扪心自问……”

“住嘴！”军法处头子一阵怒喝声。

“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报仇！”他说的是那样斩钉截铁。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使敌人胆颤心寒。

敌人只得使出最后一手，把崔景岳、孟长有和马文良三位同志立即推进了土坑。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慷慨激昂的口号声直冲茫茫夜空，久久地回响在山川城镇之上。这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深夜最黑暗之时。

光荣的共产党员——崔景岳同志，在人生的道路上仅仅度过了三十个春秋。

红军解放盐池城

盐池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还带着东征硝烟的红军指战员，又投入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西征战役。

我西征红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指挥下，兵分两路，向陕甘宁边界地区挺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八八、八十一师和红二十八军等部，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从延川、贾家坪地区出发，经安塞、保安一线，挺进“三边”高原。首战宁条梁告捷，守敌不堪一击，狼狈而逃。接着，七十三师夜袭小桥畔，七十五师进攻安边城，均未克。遂挥师向西，经由定边之红柳沟，盐池之二道沟、苏堡子、麻黄山、大水坑等，一路上在青山、毛儿庄、萌城等地扫清阻敌，解决了盐池县的部分地区，挺进到豫旺一带。七八八师则接着围攻安边城（今属定边县）。不久又接到命令，由宋时轮所部红二十八军接替围攻安边的任务，七八八师继续西进。

七八八师下辖三个团，每团四百余人，主要装备是大刀、手榴弹、长短枪和少量机枪。虽然武器较差，但却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师长是韩先楚、政委是崔田民。

六月十六日，七八八师进抵“三边”重镇定边城下，并在当夜发起猛攻。十七日拂晓，三个团的主力先后突入城内。韩先楚进城指挥作战，崔田民当即拟电向总部及军团部报告战斗结果：攻克定边，歼灭马鸿逵一个骑兵连及保安团全部，俘

敌三百五十余人、缴获战马一百八十四匹。总部当即复电嘉奖，并指示：“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继续向盐池侦察前进。”这里说的“宋、宋”，系指二十八军宋时轮军长和宋任穷政委。

六月十八日，七十八师即将定边防务交红二十八军。十九日，韩先楚与崔田民（宋时轮也一同前往）带着七十八师连以上干部，骑着在定边缴获的战马，前往盐池勘察地形、侦察敌情。骑兵团派部队担任警戒，大部队随之向盐池城下调集。

盘据在盐池城内的伪县长屈仲（外号屈胡子），见红军攻克定边，威胁盐池，十分惊慌。他一面向马鸿逵呼号救援，一面把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马鸿逵派员从农民中强行抽集的五六百人的壮丁队和临时拼凑的商团、民团统统集结进城，日夜操练，准备负隅顽抗。马鸿逵得报，急派其骑兵二团一营于六月十五日从惠安堡、大水坑方向驰援盐池。敌骑兵营是清一色的黑马队，武器装备优良。开进城后，屈胡子立即与营长孙兆祥谋划了对付红军的办法：紧闭城门，盘查行人，四处抓差，修筑工事，扒运城墙根下的沙子。伪警察局、盐务局、保安队等反动地方武装四五十人，荷枪实弹，倾巢出动。又有各种反动宣传，聒噪塞耳。敌人满以为这样一来，盐池就固若金汤、万无一失了。当我七十八师骑兵侦察员抵盐池城下侦察时，躲在城墙工事里的敌人看到红军战士们非常年轻，轻蔑地说：“娃娃兵还能打仗？”

六月十九日，我部队集结到盐池城下以后，师部马上召集二三二团团长王得荣、政委刘懋功，二三三团团长彭仪隆、政委周庆安，二三四团团长何光宇、政委贺大增等研究部署，于当晚向城里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红军指战员不怕伤亡，勇猛攻击。敌人凭险死守，疯狂扫射，战斗十分激烈。城墙高而

厚，一砖到顶，结构坚固；城周围地形开阔，隐蔽条件很差；红军指战员长途奔袭，鞍马劳顿；敌人以逸待劳，居高临下，依托城墙加工事拼命顽抗，攻城条件对我军很不利。由于我军无重武器和爆破器材，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未能攻克，师指挥部即下令撤出战斗。

六月二十日白天，红军围而不打。我军一面抓紧时间休息，一面做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向群众了解了城内敌情、地形，重新研究了攻城方案：确定二三二团位城北，担任主攻；二三三团位城南，二三四团位城东，为佯攻。天黑后发起总攻，天亮前解决战斗。

当晚，嘹亮的军号声划破夜空的寂静，顿时，枪声大作，杀声四起，红军从东、南、北三面向敌人猛攻。在机枪掩护下，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架云梯奋勇登城。敌人依仗有利地形和优势火力，疯狂射击，红军指战员几次登城都被压了下来，十几名战士英勇牺牲了。但红军没有退缩，攻势越来越猛。城内敌人困兽犹斗。屈胡子身穿老羊皮袄，腰系毛绳，手握铡刀，催阵督战。声嘶力竭地叫喊：“打！给我顶住啊！”孙兆祥手提盒子枪，在城墙上跑来窜去，指挥顽抗：“弟兄们，给我狠狠打！”话音未落，“乓”地一颗子弹飞来，结果了他的性命。接着，红军从北城墙三星店西侧打开一个突破口，战士们强攀云梯，跃上城墙，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城头上，喊杀声、枪弹声连成一片。伪公安局长张某等被我击毙。屈胡子见大势已去，慌忙揣起县印，与敌付营长李国栋及几个亲信随从，窜至西城墙，不顾死活，纵身跳下，跌跌爬爬向西逃去。敌兵失去指挥，乱成一团，纷纷交械投降。这一仗，红军毙伤及俘虏敌人一个骑兵营、一个保安团、伪政府

武装警察、商团、民团等共计千余人，缴获战马二百余匹，五十瓦特电台一部及大量枪枝弹药、军需辎重，取得了重大胜利。

六月二十一日（农历五月初三）凌晨三时，鲜艳的红旗插上了盐池城头。广大回、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欢迎、犒劳红军，庆祝翻身解放。农民歌手王猷还编了一首《红军打屈县长》的盐池民歌，在群众中演唱：

花马池（即盐池城），四方方，

坐了个坏孙屈县长。屈县长，心太硬，他把百姓赶进城，
太不讲良心。

红军来了信：“我们的人马要进城。

我们的人马进了城，个个弟兄不胡行，
都是自家人。”

红军进城以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群众爱戴。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写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保护工商业者”、“保护知识界、科学界、文化界的一切进步分子”、“欢迎白军与红军一路北上抗日”等醒目标语。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盐池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

隆德县地下党的回忆

陈添祥口述

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八月，我遵照当时甘肃工委的指示（后改受平东工委领导），以特派员身份，化装走乡串户的货郎，打入敌占区隆德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现因事隔多年，又年老体弱，故本人所述，难免有差误或遗漏，敬请知者指教。

一、两封加急电报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一天的晚上，我和延安中央党校第五部的同学们，正沉浸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欢乐之中，忽然，我班党支部书记刘××通知我说，甘肃工委来电报叫你回去。

当时，我实在不愿离开延安。

我的家，祖辈受苦，不识一字。三八年八月，我入党后，曾在边区任过区委书记，但因不识字，自己还哭过几次。四三年初，甘肃工委送我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才学了点语文和初小程度的算术，同时也初步懂得了点革命的理论，我在延安还参加了开荒、做纺车、纺线……，特别是我几次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课，他老人家还专门在我的草纸笔记本上，用毛笔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更使我终生难忘。

如今，突然叫我离开延安，感情一下子转不过来。

第二天，我向党校一位负责同志提出，让我上前线和国民党